

曾国藩多方关心金陵书局，查阅《曾文正公手书日记》（上海中国图书公司石印本，1909年版）：同治六年三月，他赴江督之任；十二月十九日，“出门至圣庙，勘视泮池、崇圣祠、明伦堂、尊经阁、飞霞阁等基地，与书局张啸山、李壬叔等一谈，归已午初三刻”。同治七年正月廿一日“二更后核定刻字法式四条，书局章程八条，约改三百余字”；四月二十日“已初出门至文庙一看工程”；八月初三日“五更三刻起，至文庙丁祭，黎明行礼，礼毕看新成之泮宫、照壁、明伦堂等，信为伟观”。啸山为张文虎之字，李壬叔名善兰，同任校勘，多年未断，均同在曾之幕府。按各书记载，金陵书局原设于江宁城南铁作坊（现南京城内已无此巷名。其铜作坊、铁作坊南北向相连，后铁作坊南端由于拓建东西向马路，所余北端改称铜作坊，成为其向南延续的南段，而铁作坊一名遂被取消。）太平天国谭绍光慕王府，后迁朝天宫，所用房舍为飞霞阁及尊经阁等处。可以说书局决定迁移和开始迁移在同治六年，而工程实在同治七年全部正式竣工，整个书局房舍迁定、章程核定以及正常进行校勘、刷印等工作，则在同治七年方可谓一切就绪，柳氏所称七年移局飞霞阁，应是合于史实的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京图书馆

王彦威父子与《清季外交史料》

严振非

王彦威（1842—1904），字弢甫，浙江黄岩城关人。同治九年（1870）举人，历任工部虞衡司主事、营缮司员外郎、军机章

京、江南道监察御史、太常少卿。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，为军机处汉官领班章京。清代自道光中期起，对外交涉日益增多，光绪朝更是频繁。可是，有关外交的文件从未系统刊行。常常依靠外籍辗转译述，失实颇多。王彦威供职军机处，面对国势衰弱，痛恨列强侵略，深感外交资料的不足，决心编纂一部记载外交史料的文献。于是，首先从“大库”内抄录道光、咸丰、同治三朝钦定未刊的《筹办洋务始末记》，以及光绪元年至十二年（1875—1886）的外交案卷。然后自光绪十二年起，每日记载诏令、奏章、折片、条约、照会、电报、会议记录及“留中”不发的机密文件。内容涉及外交、政治、军事、教育、商务、实业、交通、边防等。采用编年体纪事，区别情况，慎重选择：对于朝臣迁调升降一概不记，奏议中无可研究则删去，冗长文字取其精要，唯对关文大计、折片电报一字不遗。特别是各国使馆照会、会议笔记、签订的条约等，作为根本要旨。

王彦威在军机处繁忙的公务之暇编纂此书，往往夜以达旦，十余年积稿盈笥。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，慈禧误听外国主子要光绪执政的谎言，利用义和团“扶清灭洋”口号，谕旨各国使臣限三日回国，由军机处发出。王彦威得知，奔走于荣禄等重臣之间，说：“都城内外，乱民纵横，使臣一出，必遭其祸，从此外交决裂不可收拾矣！”慈禧专权，呼号徒劳，痛哭流涕说：“恨吾卑，无奏事权，不能救国也。”八国联军进攻北京，慈禧仓皇出逃。王彦威掘地深藏手稿，随行西安。还都后，十分不满慈禧卖国行为，在与其子王亮的信中说：“不惜城下之盟，纳款请成，遂据榻旁而睡。棋输一局，错铸九州。”终于忧郁成病，于病榻将手稿整理成《筹办洋务始末记》一百八十二卷。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二月作序：“垂二十年所得，朝章国故止在于此。……冀子若孙，勉承余志，毋废半途，俾一朝文献不至湮没。”病危时，将一生未了之事，嘱咐其子王亮：“身可杀，书不可亡。”

同年秋病卒，终年63岁。

王亮(1880—1966)，字希隐，王彦威远房之侄，过继为子。清末毕业于北京大学堂与南京陆师学堂。历任陆军部员外郎、国务秘书、驻秘鲁嘉里约领事、外交委员会科长、外交部条约委员。王彦威逝世时，正任职秘鲁。回国后奉命赴西方九国及日本考察政治。辛亥革命后留任外交部门，出使外国。王亮共出使过十六个国家，深识外交艰巨，就悉心整理王彦威遗稿。时清代已亡，遂搜集续编光绪三十年至宣统三年(1911)的外交史料。整整化了十年，得以编成。连同王彦威《筹办洋务始末记》，共二百四十三卷，取名为《清季外交史料》。为便于查阅，王亮又编《索引》与《外交年鉴》附于书后。另制《清季外交史料地图》十六幅。《清季外交史料》五册二百四十三卷，终于在民国二十三年(1934)正式刊行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浙江省黄岩县志办公室

清林树梅《说剑轩余事》中的印刷史料

官桂铨

我国刻板印刷流传了一千多年，但是专门记叙刻书、印书方面的文字极为少见。清代道光年间林树梅完整地写下了《刻书》、《印书》、《晒书》等几则文字，为我国研究中国书史提供了很有用的资料。这些篇章未见刻本流传，我见到的是民国间沈祖彝传抄的林树梅《说剑轩余事》一书中的几则。《说剑轩余事》包括《镂蠹》、《刻书》、《印书》、《晒书》、《藏书》、《油纸》，附录林焜熿《铁笛生小传》。题“金门林树梅偶笔，侯官